

多元一体：近郊旅游乡村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分析

王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陕西省咸阳市, 712100; 1343657613@qq.com)

摘 要: 本文以甘肃省嘉峪关村为研究对象, 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背景下, 嘉峪关村凭借 5A 级景区的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从而实现了从传统村落到城郊融合的旅游乡村的转变。因此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和深入探究近郊旅游乡村的空间演变与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 政府权力、资本逻辑、游客与村民主客观互动是推动嘉峪关村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多元一体的动力机制共同作用最终将嘉峪关村改造为城郊融合的旅游乡村。在空间生产过程中, 政府、资本与主客互动的多元动力通过嵌套式协同与动态博弈, 共同构建了“政府引导—资本筛选—社会反馈”的多元一体的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这一动力机制贯穿于嘉峪关村乡村空间的功能转型、价值重构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关键词: 近郊乡村; 空间演变; 生产机制

引言

近年来, 党和国家始终高度关注农村问题, 始终将“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农”问题的妥善解决置于关键位置。早在 2018 年, 李克强总理于《政府工作报告》里着重指出, 要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2021 年 2 月 21 日, 中央一号文件再度颁布, 再次强调了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不过, 要切实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 并非短时间能够完成, 这需要我们全面规划、综合考量。在国家大力推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 乡村旅游作为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日益受到关注并迅速崛起。

嘉峪关村的乡村旅游正是在近几年乡村旅游产业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逐步兴起的。嘉峪关村依托 5A 级景区, 凭借这样的优势发展本地区的旅游产业, 既顺应了当下国家旅游发展的大趋势, 也是当地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年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 乡村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日益凸显, 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 国内学术界对乡村空间生产的研究呈现从城市到农村的学术转向, 以空间作为核心分析框架重新审视乡村发展问题。

基于此, 本研究以“空间生产”理论为指导, 深入探讨近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理顺近郊旅游乡村空间生产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 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 文献综述

近年来, 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空间转向催生出新的理论范式, 空间生产研究顺势成为当下社会学研究的崭新热点。“空间生产理论”作为一种极具创新性的理论分析视角, 得到了中国社会学家的广泛认同, 并大量运用。对空间生产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时, 可以发现其主要围绕四个方向展开研究。

1.1 乡村空间生产的分类研究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 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为乡村社会转型注入了新动能。城乡空间关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构, 面对这种多维度的社会变迁, 社会学研究范式开始突破传统静态分析的局限, 转而从动态生产视角重新审视乡村空间的社会建构。

基于空间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多数研究者直接或间接地在研究中引用该理论，并以此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把乡村空间的生产生活等各类实践活动和现象纳入其中。此类研究主要应用于对乡村相关现象与问题的剖析。学者们从时间维度、文化表征维度及村落文化空间维度构建了分析框架，为理解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结构与生产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1]。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中，部分研究者从数字治理的“空间转向”视角出发，运用空间生产理论，以物质生产、社会治理和精神文明三个空间单元为切入点，构建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空间治理的分析模型[2]。关于乡村空间整合的研究，学者们提出了基于治理性发展、社区性整合与生活性重建的三维分析框架，强调通过协同发展实现乡村空间的再生产。这一框架不仅为解决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的治理难题提供了系统性思路，也为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提供了理论支持[3]。

1.2 乡村空间生产的要素构成研究

该领域研究重点关注空间生成机制的要素解析。学界普遍通过剖析空间要素的互动关系揭示其生产机理，其中要素影响力评估成为研究核心。在解析当代空间生产机制时，创新性地引入“权力—空间”分析维度，与既有“资本—空间”理论形成互补，以此阐释中国语境下空间生产的特殊性与普适性规律[4]。通过突破传统三元主体框架，将村寨旅游发展主体扩展为政府、企业、村民、旅游者、非政府组织与旅游资源六大要素，形成旅游空间生产的新型动力机制[5]。提炼古镇空间生产的三维动力模型——权力结构主导制度框架、文化生产维系特色基因、资本循环驱动空间重构，并识别出文化遗产、商业运营与旅游开发三大生产类型[6]。

1.3 乡村空间生产的现象研究

我国推行市场化改革以来，权力与资本对乡村空间进行强力改造，地方话语权的缺失致使空间生产失衡、异化以及商品化等空间非正义现象频发，这些问题成为当下社会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在旅游发展的推动下，传统村落的文化空间面临解体与重构的双重境遇[7]。若要实现乡村空间的健康，必须回归村民的日常生产实践，推动乡村旅游与村民生产生活融合，构建以村民为核心的三生空间[8]。对于地方性生产中旅游空间不正义现象，科学规划与地方理性生产是达成空间正义的有效办法[9]。

所以正对乡村空间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不少学者业提出相应的解决方式。有学者认为应当建立制度与提升村民相关意识双管齐下，建立完善乡村旅游发展的监督保障制度，培育村民价值观念和绿色旅游的生产意识加以解决[10]。还有些学者反思乡村旅游空间正义缺失问题是因为没有对当地政府权力进行明确规范，因此需要增强村民的主体性，对政府权力进行明确规范[11]。

1.4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的过程中，乡村旅游已然成为学术研究与实践的焦点，而且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仍在不断拓展延伸。追溯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乡村旅游开始萌芽并逐步发展起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如今已发展到规模化阶段，并衍生出多维度的研究路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审视，国内学界主要存在两种研究范式：一种着重关注经济与产业维度，把乡村旅游视作推动乡村走向市场化、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路径；另一种则侧重于文化遗产维度，强调地域文化的重新构建对乡村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在以经济价值为导向的研究框架里，学者们往往将乡村旅游界定为一种现代化的产业形态，重点关注它所具备的生产性功能以及消费性特征。首先以乡愁经济为导向构建新型消费空间，本质上遵循需求导向型的资本运作模式，也就是通过打造特定的消费场景，促使过剩的城市资本向乡村转移[12]。工商资本进入乡村领域呈现出双重特性：从经济层面来看，一方面催生了农业产业化加速发展、区域 GDP 显著提升以及农户收入增加等明显成效[13]；另一方面，也在逐渐削弱传统村落社会长久以来维系的“乡土性”特质，具体表现为地方性生产生活秩序的自组织系统面临被瓦解的风险[14]。

针对旅游经济对文化场域的入侵效应，文化修复理论主张通过系统性再生产机制重塑价值体系[15]，其核心命题在于：维系“乡村性”文化基因既是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根基，也是抵御资本异化的关键途径。基础研究表明，传统生态智慧与地方知识体系构成：“乡村性”的认知基础[16]。情感驱动论揭示乡愁作为现代性补偿机制的功能，游客的怀旧消费本质是都市群体对抗时空压缩焦虑的心理投射[17]，这推动乡村空间转化为具象

记忆载体,形成仿古建筑与仪式展演构成的乡愁景观[18];资源转化论构建“国家—市场—传统”三元动力模型,指出文化资本化是权力博弈下的意义再生产过程[19]。

2 多元一体:近郊旅游乡村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分析

2.1 主导:政治权力——乡村空间生产的内在动力

政府在旅游资源整合、调配以及乡村空间规划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是旅游型乡村开发的重要支撑力量。在乡村旅游开发初期,政府常以“全能主导者”的姿态介入其中。凭借行政政策指令与资源垄断等手段,对乡村空间展开统一化改造。具体而言,主要通过合理运用权力进行有效的乡村空间规划,以及精准供给相关政策,实现对乡村整体空间的调控。

在旅游业初期政府主导的规划通常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空间设计。在嘉峪关村,地方政府曾直接划定旅游核心区、居民安置点和生态保护区,通过强制性手段实现空间重组。这些改造虽提升了基础设施水平,却也削弱了乡村的在地性特征。初期,鉴于乡村旅游前景的不明朗,多数村民仅把旅游活动视为农业生产的补充。彼时的嘉峪关村,尽管具备发展旅游的天然优势,但长期以农业生产为主,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严重匮乏。面对基础设施薄弱、市场机制尚不成熟的局面,政府充分发挥行政力量的优势,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分散的村落资源进行整合优化。嘉峪关村当地政府制定了有关的旅游的整体规划,明确乡村旅游发展方向和功能区的规划,在旅游政策上给予有力的导向支持,以此推动乡村空间重构。政府权力的主导,在嘉峪关村旅游发展的初期保障旅游活动在嘉峪关村空间内实现有序开展,提供良好的发育土壤以促进旅游的快速发展和乡村经济的快速增长。

政府作为当地乡村政策的落实力量,不仅对完善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还进一步推进了嘉峪关村村容村貌的改进工程,使得嘉峪关村变得更加宜居、便捷、环境优美,自然而然增强嘉峪关村对游客的吸引力。然而,政治权力的介入并非单向度的控制。在实际操作中,村民、企业与政府之间常因利益分配产生摩擦。例如,部分村民对土地征用补偿不满,或对旅游收益的分配机制存在质疑。此时,地方政府需要充当调解者,通过建立协商平台、完善利益共享机制等方式缓和矛盾。这种动态博弈使得政治权力既是空间生产的推动者,也是多方关系的协调者,最终在制度框架内实现空间的渐进式改造。

2.2 筛选—资本:乡村空间生产的外在动力

在旅游经济、文化消费的多重驱动下,资本通过市场机制重新定义乡村空间的价值逻辑——不同区位条件下的土地被资本分类分级,民居的生活场所转型为生产消费空间,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乡村的物质形态,更重构了其社会关系与意义系统。资本的力量既是乡村空间生产的加速器,也是传统性消解的催化剂,其双重效应揭示出乡村现代化进程中难以回避的结构性张力。

资本对乡村空间的改造始于对资源的“择优筛选”。市场机制如同一张精密的滤网,将嘉峪关村的空间要素按变现潜力重新排序:毗邻交通干道和核心景区的房屋和土地被优先开发。“以前村里宅基地最好的位置都是村里靠中心的地方,但是现在整个反过来了,挨着村边的房子可沾光大了……挨着马路生意好!”(访谈记录 20240712hj)

资本对乡村空间的介入是基于市场需求的精准筛选。这种筛选既包括对区位、资源的评估,也涉及对文化符号、消费潜力的挖掘。在资本视角下,嘉峪关村的空间价值首先取决于其与关城景区和城市消费市场的距离。所以嘉峪关村的空间筛选正是资本通过多重标准重新定义空间价值的过程。而那些乡村北部远离核心景区、改造成本较高的民居,或因缺乏“游客吸引力”的普通农田,则逐渐沦为资本视野中的“边缘地带”。这种资本的筛选逻辑导致乡村内部的空间分异。资本的空间选择并非随机,而是严格遵循“投资—回报”的经济理性,其筛选标准与村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往往存在错位。

嘉峪关村旅游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家庭宅基地使用方式的重大变革。许多家庭将自有住宅改造成民宿或客栈。这种改造使得家庭空间属性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传统的居住场所演变为具有经济价值的经营资产。通过经营民宿或出租房屋,村民实现了居住功能与商业功能的分离,宅基地被纳入市场经济体系,成为可进行市场

化交易的商品。这一转变体现了居住空间向生产资料的过渡，反映了乡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同时资本的介入还重新定义了村民的角色：从土地耕作者转变为服务提供者。

文化符号的资本化构成了又一重筛选准则。资本精准洞察到城市游客对于“丝路戈壁”以及“休闲旅游”所蕴含的情感诉求。在资本投资看似活跃的表象背后，嘉峪关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正遭受着隐性的侵蚀与改造。其中首当其冲的是随着游客的持续介入，嘉峪关村村民的生活居住空间渐渐分化为两个并行的体系：一个是依据游客需求所界定的“前台”，另一个则是村民真实生活的“后台”。旅游活动的不断深入，使得村民的日常生活异化为一场剧场式表演。这种空间上的割裂，不仅改变了空间的功能属性，更对文化表达的形式与内涵产生了重塑作用。

“前台”空间愈发呈现出剧场化的特征。当资本将乡村空间打造成“文化展示窗口”时，村民的日常生活不得不进行自我调适。“前台”是游客与村民直接互动的区域，村民在这一空间展示并演绎着契合游客对乡村想象的文化内容。游客借助“前台”所呈现的景象，来了解和体验乡村文化。然而，这些文化往往是出于旅游发展目的而重新包装、演绎的表面化成果。

“后台”则是乡村日常生活的文化承载空间，是由当地村民掌控、具有独特文化意义的区域。这里对游客的进入以及旅游业的干扰进行了限制，村民在此保留着最为真实、质朴的日常生活状态。但在旅游发展的驱动下，村民的“后台”空间正逐渐被压缩，如今，村民往往只有在自己居住的房间内才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为游客提供舞台文化表演展示的前台与乡村核心文化及村民日常生活的后台形成相区隔的分离，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作用。这种空间的分隔与文化的隐匿，折射出乡村在文化自信与生存压力间的摇摆。当游客带来的经济收益越丰厚，村民越难抵抗将文化“商品化”的诱惑，真实的生活实践逐渐退守至私人领域。

资本带来的竞争逻辑重塑了人际交往规则：曾经互帮互助的村民成为民宿生意的对手，这种转变在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也瓦解了乡村社会传统的互惠网络，将熟人社会推向契约化的陌生人秩序。资本如同一把双刃剑，在激活经济的同时切割着乡村的社会肌理。

除去以上资本对于空间的筛选与分化，更隐蔽的是资本对嘉峪关村村民时间秩序的重新编码。城市快节奏与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对乡村传统的慢节奏、相对单一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资本通过重构时间表，将嘉峪关村纳入现代消费社会的运转节奏，这种改变在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也消解了乡土社会原有的时间感知。资本对空间的改造从来不止于物质层面，它通过重新配置资源、调整功能布局，深刻介入乡村的社会肌理，最终形成乡村空间的转型。

2.3 主客观互动：乡村空间生产的反馈动力

嘉峪关村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优势积极发展旅游业。同时，通过休闲农业的打造，成功吸引了外地游客与本地城市游客，实现了从发展迟缓到充满活力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游客所代表的外来文化与嘉峪关村村民所承载的本土文化之间产生了丰富而深刻的互动，极大地影响了乡村空间的演变。

这一过程中，外来游客与本地村民的相互通过主客互动构建起复杂而动态的文化关系网络，形成了推动乡村文化生态革新的双重力量。以游客为代表的现代城市文化携带着消费观念、审美偏好与生活方式涌入乡村。从多个方面对乡村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作为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群体，村民们是地方知识体系当之无愧的持有者，他们对当地文化蕴含的精神内核有着深刻的体悟，对农耕智慧所衍生的生活哲学更是谙熟于心。这种深厚的文化资本，成为了村民在与外界主客互动过程中掌握话语权的关键所在。而村民则凭借对本土文化的深层认知与情感联结，在接纳与调适中重塑乡村空间的文化表达。曾经，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村民们可能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但如今，他们转变角色，通过对自身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村民们成功地将游客的凝视转化为提升文化自信与获取经济收益的双重契机。这一过程不仅为村民带来了经济收入，更让他们深刻认识到本土文化的价值，从而激发出守护与创新本土文化的内生动力。在主客互动过程中，文化交流呈现出一种“双向解码”与“共生共创”的融合模式，这一模式充满了活力与创造性。

值得注意的是，旅游业所引发的文化碰撞，本质上构成了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特殊实践路径。以嘉峪关村为例，在旅游业发展之前，嘉峪关村和许多传统乡村一样，相对封闭，文化发展较为单一。随着旅游业的

兴起,外来文化大量涌入,但嘉峪关村的村民并没有盲目排斥,而是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进行策略性吸纳与创造性转化。他们将外来文化中的一些元素巧妙地融入本土文化,不仅没有消解“乡村性”,反而强化了村民的文化自觉与创新能动性。这种由主客共建的文化生态,有着显著的优势。它避免了单纯商业化带来的弊端,防止了对乡村文化肌理的撕裂,使得乡村文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得以完整保留和传承;同时,也突破了以往封闭保守的发展模式,为近郊型乡村振兴提供了文化空间再生产的新范式。在这个新范式中,乡村找到了在守护历史记忆与拥抱现代文明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的支点,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总结

在近郊旅游乡村嘉峪关村的空间生产过程中,政府、资本与主客互动的多元动力通过嵌套式协同与动态博弈,共同构建了“政府引导—资本筛选—社会反馈”的多元一体的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这一机制以当地政府旅游发展的政策制度框架为基底、市场逻辑为推手、文化调适为调节,形成了嵌套式的作用网络,贯穿于嘉峪关村乡村空间的功能转型、价值重构与社会关系的再组织。

三者的协同本质上是目标导向、资源流动与文化适应的动态闭环:政府投资吸引资本入驻,资本活力反哺公共服务,村民文化创新增强品牌独特性,形成正向循环;但其深层矛盾亦不可忽视,标准化规划挤压生活空间,市场筛选加剧资源不均,游客凝视诱导文化表演化。嘉峪关村的实践表明,多元动力通过持续博弈实现阶段性均衡,其可持续性依赖于权力制衡与利益共享,未来需强化村民主体地位,通过参与式规划整合在地知识,引导资本包容性流动,最终在经济振兴、文化传承与社会公平的有机统一中,为近郊旅游乡村的空间生产提供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启示的多元一体路径。

参考文献

- [1] 陈波,徐若蓝.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与价值生成——以二官寨为例[J].中国软科学,2022(12):61-71.
- [2] 陈桂生,吴合庆.数字赋能乡村空间治理——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解释[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0(05):140-149.
- [3] 王阳,陈勇.空间整合与乡村振兴:新时代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实践逻辑[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9(05):42-52.
- [4] 朱力.“空间结构化”:一个解释当代中国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J].城市发展研究,2021,28(09):8-15.
- [5] 唐明贵,黎洪,胡静.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模式建构与实现路径——基于空间生产的视角[J].企业经济,2022,41(07):115-126.
- [6] 牟伦超,程励.空间生产视域下“古”镇旅游的地方营造——以恩施土家女儿城为例[J].旅游学刊,2023,38(03):107-124.
- [7] 傅才武,李俊辰.旅游场域中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生产逻辑与价值回归[J].江汉论坛,2022,(10):131-137.
- [8] 江立华,陈晖月.乡村旅游的空间生产与本质归元——基于湖南省L村的田野调查[J].江淮论坛,2013,(03):84-90.
- [9] 刘宏芳,明庆忠,韩璐等.民族古镇地方性生产中的旅游空间不正义表征及发生过程探究[J].人文地理,2023,38(04):55-61+155.
- [10] 王华,梁舒婷.乡村旅游地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的过程与机制——以丹霞山瑶塘村,2020,3-33
- [11] 袁利.论旅游空间生产的正义缺失及其治理路径[J].开发研究,2021,(05):127-132
- [12] 张京祥,罗小龙,殷洁等.大事件营销与城市的空间生产与尺度跃迁.城市问题,2011,(1)19-23
- [13] 程莉.城镇化,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增长.农业经济与管理,2020,(1):78-89.
- [14] 赵霞.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中国农村观察,2011,(3):80-86.
- [15] 李佳.乡土社会变局与乡村文化再生产.中国农村观察,2012,(4):71-75.
- [16] 李伟.论乡村旅游的文化特性.思想战线,2002,28(6):36-39.

- [17] 宁志丹, 李海娥. 乡村旅游者乡愁体验对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武汉市石榴红村为例.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9(5): 62-68.
- [18] 王成, 唐赛男, 孙睿霖等. 论乡愁生态景观概念、内涵及其特征. 中国城市林业, 2015, 13(3): 63-67.
- [19] 郭凌, 王志章. 乡村旅游开发与文化空间生产基于对三圣乡红砂村的个案研究. 社会科学家, 2014, (4): 83-86.